

南

京

党

史

精选本

书 名:南京党史精选本
编 者:《南京党史》编辑部
责任编辑:吴 斌 余 翔
印 刷 者:南空机关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12.5
印 数:1 - 8000 册
字 数:310 千字
准印证号:苏出准印 JSE - 0004030
工 本 费:20.00 元

编辑说明

《南京党史》(《南京党史资料》)从1980年创刊至今已21年了，20多年来，《南京党史》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在广大作者、读者的积极支持下，坚持教育性、知识性、可读性的办刊宗旨，征集、研究、宣传党的历史，交流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迄今为止已发表回忆、研究文章700多万字。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光辉的日子，也为了集中展示《南京党史》创刊以来的丰硕成果，编辑部从已经出版的90期《南京党史》中精选出30余万字的文章编辑成《南京党史精选本》奉献给大家。

《南京党史》创刊20多年来，发表过许多领导同志和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亲历亲闻的回忆录；许多专家学者对鲜为人知的党史人物、事件的研讨文章，其中不少作品被多家报刊转载。在这次的编辑过程中，我们重温了这些精品力作，仍然深受感动与震撼。但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对其中的一些不得不忍痛割爱，对收录的文章也作了一些删节。

为方便读者查阅，文章的编排基本以发表先后为序，目录页作者名后的数字前一数字是发表的总期数，后一数字是发表时的页码。由于我们的水平和编校力量有限，对于选编中的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作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1年7月

目 录

回忆与怀念

1 忆厉恩虞同志	江泽民(73、4)
4 回忆在南京革命活动片断	曹瑛(2、33)
9 关于通过杨兆龙的关系营救被捕同志的回忆	沙铁因(13、73)
13 南京谈判与统战工作	李维汉(14、3)
17 怀念胡永萱	胡畏(15、92)
24 我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走向革命	郑小瑛(20、16)
31 接管南京前后的回忆片断	宋任穷(30、10)
38 回忆父亲洪沛霖	洪淄民(40、71)
44 抗日战争中的红色间谍 ——忆反法西斯战士中西功和西里龙夫同志	方知达(57、10)
52 记反对王明路线的一场斗争	陈修良(62、12)
56 白区岁月 ——到南京开辟党的工作(1942—1949年)	刘峰(65、15)
64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	刘卫平(73、9)
72 亲切的接见 巨大的鼓舞	王富民(79、12)

金陵风雨

- 76 刘伯承创办南京军事学院 胡明华(38、8)
80 陈独秀南京受审记 吴雪晴(39、35)
87 周恩来的悼念
——一位南京市委书记之死 奚金芳(40、2)
91 划破南京夜空的电闪雷鸣
——记宋庆龄 1933 年 4 月南京之行 经盛鸿(42、2)
99 南京解放后中美谈判纪实 陈广相(42、14)
107 驱逐梵蒂冈驻华公使黎培里始末 双 日(48、14)
114 轰动中外的南京日谍案 李 冀(49、47)
123 南京大屠杀中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孙宅巍(52、32)
132 胡风、巴金南京求学旧影 翟 扁(60、17)
137 胜利渡江进石城
——解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在南京 陆庆良(65、2)
146 中国革命三位伟人与南京 邓小文(76、28)
153 1976 年南京人民的反“四人帮”运动 尧 生(76、17)
163 “文革”初期南京“一·三事件”真相 伍 宁(87、18)

革命人生

- 171 追杀叛徒的“画锦里谋杀案”
——为纪念中共中央特科红队四烈士而作
..... 经盛鸿 经盛志(43、28)

182	碧血丹心照汗青	
	——记无畏的共产党员陆兰秀烈士	吴小伟(49、20)
191	情报战士血洒台湾	封荣生 经盛鸿(64、18)
197	许世友将军与酒的缘份	苗 生(66、30)
202	党外亲密战友	
	——杨杏佛与南京	李志跃(70、23)
208	周恩来与孙津川的革命情谊	钱士鹤(72、4)
214	为党尽忠 以死抗争	
	——王范同志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公开斗争	
		孙良铭 经盛鸿(81、19)

史海钩沉

221	鲜为人知的台湾共产党	陈红民(38、32)
231	鲍君甫的谍海生涯	程堂发(40、15)
239	轰动国内外的牛兰“国际共谍案”	尧 生(40、31)
248	布哈林的悲剧结局	蒋逸民(41、35)
254	澳门隐“僧”	尧 心(42、35)
258	国际共运史上触目惊心的一页	
	——苏联 30 年代的“大清洗”	蒋逸民(43、36)
265	胡适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	红 心(46、27)
273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	阿 甫(47、35)
282	国共分合与陈立夫的两段秘闻	吴晓晴(47、42)
290	炮轰天安门阴谋的破产	史 平(48、11)
297	杀人司令谷正伦	高学亚(50、41)

302 血与火的历史

- 关于《红岩》中的《挺进报》事件 双 日 (52、22)
311 曾经审讯过蓝苹的黑大汉 陈 淦 (53、42)
314 功败垂成的五次谋刺汪精卫 孟国祥 (54、46)
320 蒋介石与希特勒 陈红民 (54、35)
327 端纳——旧中国政治舞台的一面镜子 许亚洲 (58、42)
337 闻名海上的“怪西人”案 沈 焱 (59、34)
346 老一代革命家揭露江青历史问题的英勇斗争
..... 李 莉 (60、9)

355 国人唾弃的三个汪伪巨奸

- 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蜕变纪实 文 垣 (60、44)
363 方志敏遗稿传递者的曲折人生 晓 梦 (63、45)
370 “新疆王”盛世才的浮沉 蒋逸民 (69、41)
377 不忠不义的“忠义救国军” 孟国祥 (71、28)
384 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前前后后 章 云 (72、39)
390 风雨五载话“摇篮”
——莫斯科中山大学追记 韩文宁 (76、40)

忆厉恩虞同志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七日)

江泽民

六月六日，我参观了公安部举办的禁毒展览，看到了毒品对青年人的毒害和给多少个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危害，了解了全国各地为禁毒进行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我回想起抗日战争时期，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中共地下党组织曾经领导爱国进步学生发动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毒运动，也自然回忆起那场运动的领导人厉恩虞同志。

那场清毒运动发生在一九四三年冬。当时，我与恩虞同志同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他念外国文学系，已是高班四年级的学生。我进大学不久，是电机系的低班学生。这时，我们相互还不认识。我作为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参加了那场运动。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我们几千学生高呼禁毒口号，游行到夫子庙一带，冲砸了所有的鸦片烟馆，把醉生梦死的吸毒者揪了出来，其中不少是敌伪官员，还抄出了大量鸦片、毒品和烟具。我们在国民大会堂广场前焚烧收缴的鸦片、毒品和烟具，同学们围着熊熊的篝火，齐声高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在我们后面，日本宪兵队持枪列队，虎视眈眈地对着我们。大家悲愤满腔，情绪激昂，毫无畏惧。其情其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唤起了群众的觉醒。那个时刻，我不禁想起了鸦片战争的历史，想起了九·一八事

变和七·七事变，想起了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心情十分激动。记得恩虞同志当场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深深打动大家的心灵，令人久久不能忘怀。当时，我对为什么能在日伪统治下开展这样的运动并不了解，后来知道是由于我们地下党组织巧妙地利用了日伪机构的内部矛盾。

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交大读书，一直未与恩虞同志见过面。一九四六年冬，我的入党介绍人王嘉猷同志找到我，说恩虞同志从苏北根据地来，要在上海隐蔽一段时间，希望能在我姨妈家住下。他讲明我只照顾他的生活，不负责同他进行工作上的联系。后来，有位“老徐”同志来同他联系（直到解放初，我才知道这位“老徐”就是贺崇寅同志，当时任上海总工会秘书处长）。那时，我是穷学生，但我尽可能在生活上接济恩虞同志。大学生有联合国救济总署发放的一些物资，如面包、牛奶粉和罐头等，我常带点回来给他。有时，他就在我姨妈家吃饭。他给姨妈的儿子福宝辅导功课。后经我介绍，他在青年会职工业余学校也兼点课。我深深记得，他博览群书，记忆力特别强，有相当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由于他在清毒运动中的声望，我们不少进步同学都与他有接触，他在我们中间是老大哥。这些同学在那次运动以后都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他撤退回苏北根据地，我到车站为他送行。到根据地后，他改名叫陈震东。

后来我们天各一方，忙于自己的工作，直至五十年代末才又相见。我默默之中感到他心情并不愉快。起初我以为他有什么家庭问题，后来知道是因为过去的一段经历受到误解。尽管他内心深处是痛苦的，但他从未在我面前发过牢骚，总是显得很乐观，并始终勤勤恳恳地工作着。他的党性是很强的。我根据自己较长时间同他相处的了解，政治上是信任他的。对他的生活和健康，我和贺崇寅同志也一直很关心。一九七七年，他患了晚期肺癌，我曾写信安慰他，鼓励他同病魔作斗争。他不幸于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七日过早地

逝世了，时年五十九岁。恩虞同志过世后，我们对他的家属继续予以关心。

在几十年的革命过程中，有多少无名英雄为革命贡献了一切。由于一些复杂的历史原因，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临死还背了包袱。我们活着的人只能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当年为革命奋斗的人们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做好党的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也不怕受到委屈。即使受了委屈，也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抱着坚定的信念。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现在，南京市委已为恩虞同志作了正确的政治结论。这是我们党坚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的老同志们采取的十分负责的态度，也是对历史采取的十分负责的态度。

回忆在南京革命活动片断

曹瑛

1930年夏天(大约是8月初),我受中共江苏省委的派遣到南京去任市委副书记。与我同去的还有我的爱人苏订娥同志。在炎热的天气里,我们从上海乘火车到南京,很快与市委书记曾钟圣同志接上了关系,一个多月后,钟圣同志被敌特注意,不久即奉命调往上海党中央军委工作,于是组织上决定由我代理南京市委书记。

这一时期市委负责南京军事工作的委员是杨子庄(据说后来叛变了);不久杨子庄走了,由顾庐同志接替;组织委员是印刷厂的一名工人同志;宣传委员是中学里的一个同志,四川人;还有市委委员顾志鹤同志。组、宣委下面各有两名干部,可惜,姓名都不记得了。这时的南京市委机关设在南京三步两桥,租了曾国藩的孙媳妇家的房子。互济会是党的外围组织,负责人是秦世昌先生,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蒙藏委员会的一名高级职员。

当时,南京党组织的分布情况是:工厂系统有和记蛋厂、浦镇铁路大厂、南京金陵兵工厂、电灯厂、印刷厂等支部;军事系统有中央军校的入伍生团和军官团、航空学校、卫戍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等支部;学校系统有五卅中学、南京中学、钟南中学、晓庄师范、金陵女中等支部;中大、金大没有支部,只有部分党员;守卫中山陵的人员中也有党员同志,还有几个街道支部。

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地下工作者的住所东搬西迁是常有的事。我在南京不到一年,曾先后四次搬家。刚到南京时,住在中华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不久,搬到成贤街一家杂货铺的后屋。以后发现有盯梢的,立即转移到珠江路北门桥一家木器店里。后来,又

由木器店搬到(山西路)三步两桥附近的一间破旧的小房子里。那时,党的活动经费非常紧张,组织上每月发给我们的津贴费只有几块钱,生活十分艰苦。家里常有当票,典当物品就是几件衣服,我们就冬天当夏天的衣服,夏天再当冬天的衣服,换点钞票来维持生活,从事革命活动。平时,不敢在饭店里饱餐一顿,只能买点大饼、油条充饥,最后连苏订娥同志结婚时穿的一套衣服也送进了当铺。尽管生活这样艰苦,但我俩都充满着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在中秋节那天,有钱人合家团圆,吃鱼、吃肉,我们却把大饼当月饼,把白开水当白酒,碰杯对饮。

1930年8月,我到南京不久,奉命前往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一个会议。组织上包了上海“小世界饭店”的一层楼,参加会议的人多数是商人打扮,来时带着礼品,装成庆贺新婚的样子。这是李立三同志主持的一个秘密会议,布置全国十三个中心城市同时暴动的计划,并要大家汇报本地情况。我在汇报中谈到:“南京党的力量虽然有了一些发展,但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当前,需要的是积蓄和发展力量。”结果受到立三同志的批评,说我根本不懂得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的关系。并说:“向困难低头,实际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他提出:目前要继续批评党内的右倾思想;限期发展相当数量的党员,加紧开展反白色恐怖的斗争,发动罢工示威直至组织公开暴动等等。在此情况下,我们按上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在南京相应地做了具体要求,如:规定在一周内全市要发展两三百名党员;积极组织工人罢工;准备武装暴动,在暴动中夺取国民党机关,占领下关电厂、自来水厂、邮电部门;要求两浦的党员在暴动前夕首先将铁路破坏掉,午夜12点如果听到南京城内枪声一响,必须立刻赶过江围攻伪铁道部,配合全国的总暴动,等等。

有一次,蒋介石到军官学校去训话,军校的地下党同志,不怕被捕牺牲的危险,公开地把反蒋的传单撒到他正在训话的会场上,

撤到他的面前，顿时引起敌人的一阵恐慌和骚乱，迫使蒋介石无法讲下去。蒋介石暴跳如雷，当面训斥了宪兵司令谷正伦和卫戍司令冯铁裴。为了迎接暴动的到来，浦厂的党员史益儒同志和工人倪永长同志，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带着木锯去破坏敌人的电杆。倪永长的头被电杆碰破了，鲜血直淌，他不顾这些，撕块破衣，把伤口扎起来继续干。他们两人硬是冒着生命危险，一个通宵锯倒了铁路两旁七根电杆。两浦的党员接到准备暴动的命令，他们立即组织起来，大造革命声势，把反对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宣传标语，从浦口街上一直贴到了三汊河，使敌人闻风丧胆。这一时期，由于执行了“左”的方针，把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一点力量基本上都暴露出来，结果损失很大，被捕和牺牲了很多同志。共产党员、中央军校军官团党支部书记文绍珍同志在监牢里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但他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直至最后光荣就义。军校入伍生团的共青团员刘雪亮同志被敌人百般折磨，打得死去活来，仍坚持与敌人斗争，当堂揭露国民党残酷镇压爱国人士的血腥罪行。当国民党反动派枪毙他时，他高唱国际歌，高呼革命口号，毫无惧色，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高尚气节，使看守所内的在押人员，无不敬佩感叹！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左”倾错误。10月份，蒋、冯、阎战争结束，国民党阵营内部出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我们乘此时机也着手恢复组织和发展革命力量。据李竹平同志回忆，当时，我曾布置他到中央军校去联系，尽快恢复军校党的组织；在金陵兵工厂的附近由我地下党开了一个小饭店，以便合法地接触一些军工厂的工人，同他们建立联系，设法找到失散的线索。恢复工作比较好的是团市委，10月，由刘振声、叶舒宁、李竹平、刘芝祥（女），还有南京花牌楼印刷厂一个姓王的工人等5人组成了新的南京团市委，以后在斗争中又发展了一些新团员，找到了一些失散的关系，他们是钟南中学的董跃光同志（淮阴中学转来的）和叶舒平同志；南京中学有两个团员；钟英中学有两个团员；中大有

一个刚毕业的姓沙的同志；中央军校有两个，共近 20 名团员。到了 11 月份，南京党员亦将近 50 人，其中发展了 3 个学生新党员。1930 年底，市委又正式作出了清算立三“左”倾错误的决议，至此，南京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

我在负责南京党的领导工作的时候，有很多的机密文件和上级指示需要转抄和传送。订娥同志是我的助手。她能刻一手漂亮的钢板字，人也机警、聪明。她经常誊抄文件到深夜，有时竟通宵达旦，白天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外出送文件。那时，南京检查很严，敌特遍设暗卡、便衣，跟踪盯梢，稍不留神，便会被捕牺牲。我们住在成贤街的时候，与市委书记曾钟圣同志住在一条街上，虽然两家相隔很近，但订娥同志每次传送文件或接受指示时，总要故意穿马路，兜圈子，绕道而行，即使到了钟圣同志的家门口，她仍然高度警惕，有时在他家门前的商店里装作买东西，有时停在他家门口前不远处，四面望望，等确实没有人注意后才进去。从钟圣同志家出来，又同样不能直接回家，只有几分钟时间的路程往往要兜几个小时甚至待到天黑才回来。

1930 年 11 月，订娥同志不幸染上了伤寒，又因交不起房租，被房东撵了出来，只得住在南京中华门内钓鱼台“湖南会馆”的一个角落里，不久病魔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几个同乡凑了点钱，买了口薄棺材，草草埋葬在雨花台旁。订娥同志去世后，我因传染，也患了伤寒，连续几天，高烧不止，几次昏死过去。组织上派了同志，想方设法把我送往鼓楼医院，才摆脱了死神。

1931 年 1 月，我第一次被捕入狱。那天，我到将军巷一号秦世昌先生家里去开互济会，一进门，发现一个鬼头鬼脑的家伙跷着腿坐在他家的桌子旁，家里的东西已翻得乱七八糟，多年地下工作经验使我立刻警觉到：情况不妙，可能发生了问题。但这时想退出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对方也发现了我。我便假装问道：“你是秦先生吗？”这家伙忙答：“嗳，请坐，请坐，秦先生买菜去了，马上就回来，

你等一等。”我说：“我刚下火车，就进城了，我出去吃点早点就来。”这家伙见我要走，慌忙拦住我，说：“不行不行！他马上就来。”这家伙的慌张，更证实这儿出事了。我暗自思量，得赶快离开，乘他出门去张望的时机，我正要溜，不料脚滑了一下，响声惊动了他，他回过头来掏出手枪对准我，叫我到宪兵司令部去谈一谈，我说：“可以嘛！为什么不早说？走就走。”我装着不在乎的样子，他把我押上了囚车送到了宪兵司令部，关在宪兵队里。后来知道，秦先生在我去之前，因为他的儿子在法国有一个贪污案，牵涉到他而被捕，不久事情弄清楚就被释放。我正因为找秦先生才被牵连进去。

我关押在宪兵队不久，中大一个叫赵宗麟的学生，四川人，是一个进步分子，因看进步书籍也被抓进来，我俩同睡一个铺上。同我们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姓刘的军校学生。

“五一”前夕，敌宪兵把我和小赵转到了国民党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与我们同关一个号子的还有章养吾同志，一个姓叶的和一个姓黄的同志（他们三个人都是党员）共计5人。我们在一起，常常谈时事，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相互勉励，相互帮助，斗争情绪始终都很高昂。5月5日这一天，我们还为马克思诞辰特别座谈过一次。在我们的启发帮助下，小赵同志进步很快，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他对我说：“我出狱后要改名叫柳耐夫（是英文 New Life 的译音，意即：新的生命），也是为了永远记住你对我的政治上的引导帮助。”后来，柳耐夫同志走上了革命的征途，参加了新四军，不幸在一次作战中壮烈牺牲了。

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我被关押了近一年，因国民党反动派毫无证据，又经秦世昌先生做保，终于在1931年底出狱了。出狱后，我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不久，接任了上海沪中区委书记，开始了新的战斗。

关于通过杨兆龙的关系 营救被捕同志的回忆

沙轶因

1948年7月10日，中央大学学生党员朱成学、华彬清、李飞三同志在赴巢湖解放区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南京市委和所属学生运动委员会（当时我在学委工作）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进行了分析研究，指示中大党总支迅速组织群众性的营救活动，首先要设法弄清关押地点，防止敌人秘密处决；同时立即要家属出面揭露，使此事公开化，并向新闻界公布，要求各界声援，以利于营救。13日，中大学生院系自治联合会组织了“营救朱、华、李三同学委员会”。14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说明三同学是无辜的，要求国民党政府按宪法规定，立即送司法机关公开审理，宣告无罪释放。就在这时，有群众向学生会反映，三同学被秘密关押在下关警察局水上派出所。中大学生院系自治联合会立即组织同学前去探监，有些主持正义的教授也出面声援，各地发来了抗议秘密逮捕朱、华、李三同学的声援函电，有的地方以罢课进行抗议。7月17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将三同学交伪首都高等特别刑事法庭进行公开审理，但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三同学判了刑，在老虎桥“首都监狱”服刑。营救斗争仍在继续，同学们纷纷表示，誓死要把被捕同学营救出来。中大扩大了营救委员会的组织，由各院系组成慰问小组轮流探监，有一次组织了几十人参加的大规模探监。同学们还发动了募捐，捐款者不仅有学生，还有教授、工友，探监时，还送消息、送食物、送书报，狱内狱外，心心相连。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不久，我方的炮声逼